

身份困惑与伦理选择

——《海上夫人》的主人公艾梨达分析

朱黎航

内容提要：易卜生的《海上夫人》是一部有关自由伦理和伦理选择的戏剧。“海婚”、“俗婚”、“怪胎”依次成为艾梨达心头的三个心结，造成了她伦理身份的混乱和困惑。只有重新回到起点进行独立、自由的选择才能解开她的心结。陌生人和房格尔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生存模式，同时还象征了人类文明的不同发展阶段。艾梨达的选择不仅是她个人对不同生存模式的选择，还隐喻了人类在进化发展的关键时刻所做出的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伦理选择。

关键词：亨利·易卜生；《海上夫人》；身份困惑；伦理选择

作者简介：朱黎航，浙江工商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欧美文学及比较文学研究。

Title: Identity Confusion and Ethical Choice: An Analysis on Ellida in *The Lady from the Sea*

Abstract: Henrik Ibsen's *The Lady from the Sea* is a drama about ethics of freedom and choice. "Sea marriage", "secular marriage" and "abnormal child" are three knots in Ellida's mind, forcing her into identity confusion and perplexity. Only by returning to the starting point to make an independent and free choice can she untie the knots in her mind. The stranger and Wangel not only represent two different modes of existence, but also symbolize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stages of human civilization. Ellida's choice does not only reflect a personal choice between different modes of existence, but also implies an ethical choice at the critical moment of human evolution, which exerts a great impact on the future and fate of human beings.

Key words: Henrik Ibsen; *The Lady from the Sea*; identity confusion; ethical choice

Author: Zhu Liha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chool,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18, China), and a Ph.D. candidat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at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China). Her academic interests are European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mail:lihangzhu@hotmail.com

在易卜生的后期剧作中，《海上夫人》（*The Lady from the Sea*, 1888）是一部象征主义手法与精神探索完美结合，极具神秘色彩和伦理意蕴的戏剧。拨

开笼罩在戏剧中的神秘主义迷雾,透射出的是作家对个体生命存在和整个人类文明进程的深刻关切和深层次思考:当一个人的自我得不到自身的真切感受时,是怎样一种生存状态?当一桩婚姻被感受为是一场交易时,该如何继续?面对非此即彼的生存境况,如何进行真正自由的选择?人类进化和文明的发展是否遵循着绝对正确的方向?易卜生曾说他的任务只是提出问题,但在这部戏剧中易卜生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使《海上夫人》成为易卜生后期创作中唯一一部结局圆满的戏剧。

一、艾梨达的身份困惑和三个心结

主人公艾梨达(Ellida)出生于海上人家,五六年前嫁给了峡湾小镇的房格尔医生(Doctor Wangel)做续弦妻子,与丈夫以及两个继女生活在一起。但是近年来艾梨达却患上了精神方面的疾病,她终日思念大海,再也不愿意和丈夫过夫妻生活。房格尔身为医生,却对妻子的病症束手无策。戏剧正是围绕着艾梨达的精神疾病展开的。

剧本通过回溯的手法,一点一点地挖掘艾梨达精神病症的根源。艾梨达十年来的生活和精神历程与两个男人紧密相关,她和这两个男人的情感纠葛成为本剧最主要的一条伦理线。沿着这条伦理线追根溯源,不难发现编织在线上的三个伦理结,这三个伦理结正是艾梨达的三个心结,它们缠绕在一起,无法解开,成为艾梨达生病的缘由。三个伦理结均是预设的,也就是说在戏剧开始时,艾梨达的精神已经陷入了困境,成为巴利斯泰口中“半死的美人鱼”。

前两个伦理结均是婚姻结。艾梨达的第一个婚姻结来自于她和一位陌生海员的一种异教式的“海婚”,这场“婚姻”除两位当事人外无人知晓。原来十年前,还是少女的艾梨达曾经与一个陌生海员有过一段莫名其妙的恋情。说他陌生是因为连艾梨达也不清楚他的真实名字和背景。当时这个陌生人是一艘船上的二副,因一起杀人事件而不得不亡命天涯。在逃亡前和艾梨达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将自己的戒指和艾梨达的戒指用一个钥匙圈圈起,奋力扔进大海宣布他俩双双已和大海成婚。在陌生人看来,这无异于正式的婚姻,艾梨达当时亦无异议。事后清醒过来的艾梨达多次写信给这个海员要求中断两人的关系,但那个海员置之不理,仍然表示将来有一天他会回来接她。从此这件事就成为艾梨达的一个心结,成为控制艾梨达心灵的一股神秘力量。正是由于这个心结的存在,艾梨达才拒绝了自己好友阿恩霍姆的求婚。显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艾梨达自觉接受着“海婚”对其灵魂和肉体的束缚,实践着对这个婚姻承诺的伦理遵守。

“海婚”的怪异并不在于这个事件本身,而是在于为何那个陌生人能对艾梨达有着巨大的控制力?为什么艾梨达一和他在一起就会丧失自身理智?这一方面源于艾梨达的自我特性,另一方面也与这个陌生人奇特的个性特点紧密相关。他们二人都有着异于常人的显著特征,像“海婚”这样的荒唐事也只能在他们俩身上发生,并对他俩产生作用。

艾梨达的特别来自于她从小与常人不同的生长环境，她的生命与宽广自由的大海相伴共生，这种特殊的生长经历造成了其特殊的生命感觉和处世态度。作为一个海上灯塔管理员的女儿，她的名字都显得与众不同，因为她父亲竟然摒弃传统，用一艘旧船的名字而非基督徒的名字为她命名！当地老牧师因此称呼她为“异教徒”。这个戏称显然预示了长大成人后的艾梨达与基督教传统伦理社会的格格不入。从小远离人类群居社会，在海边自由自在地成长的艾梨达像她的名字一样依恋着大海。对她来说，海既是神秘的又是可怕的，既能孕育一切又能毁灭一切，它总是变幻莫测，时而风平浪静时而掀起惊涛骇浪，充满了原始的野性冲动，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束缚住它。海就是自由的象征，而这种无羁的自由也正是海洋与艾梨达以及那位陌生人的精神契合之处。

陌生人在整出剧中一直处在一种晦暗不明的状况之中。他并非是一个虚幻的人物，但却始终身份不明，面目不清。易卜生在指导这出剧的舞台演出时，特别强调要保持陌生人身份的不确定性。“谁也不应该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同样也不必知道他是谁、他的真名是什么。他的这种不确定性正是我有意选择的创作方法中的本质要素”（易卜生 288）。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将陌生人与海洋象征的无拘无束、神秘莫测的自由精神联系在了一起，也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将艾梨达引入一种既害怕又向往的精神状态之中。

“那个人像海洋”，艾梨达在剧中胆战心惊地说，“里头有一股诱惑力量”（330）。¹ 这个在精神上控制了艾梨达十年之久的陌生人正是凭借着与海洋的相似与亲密走进她的生活。艾梨达初识陌生人时，他自称弗里曼（Friman），请注意这个名字的发音与 freeman 一模一样。据说他很年轻时就做了水手，海洋是他和艾梨达在一起时谈论的唯一话题。对于艾梨达来说陌生人就是“自由”这一抽象概念的具体化身，陌生人 = 大海 = 自由。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无羁的自由带给艾梨达的不仅仅是诱惑与吸引，还伴随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但却是极其强烈的害怕，因为这种自由也意味着不确定性、意味着某种未知的风险。艾梨达将引发其产生这种复杂精神感受的对象视为又可怕又迷人的东西，“我所谓可怕的东西是又使我害怕又能把我迷住的东西。”“我觉得它把我迷住的时候特别可怕”（367）。艾梨达的这种又感到害怕又觉得被其吸引的复杂精神状态正是丹麦哲人克尔凯郭尔笔下的恐惧概念！

克尔凯郭尔认为，恐惧是个体的人在追求自我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复杂的精神状态。在克氏看来，生活中随波逐流的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存者，真正的生存者是一个行动者，必须要追求作为自己命运的自我。克氏将自我视为一个实践必须终生去完成的任务，个体就是在对自我永无止境的追求中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生存。而要实现对自己的追求，必须经历恐惧这种特殊的精神状态。恐惧不同于一般的害怕，害怕总有一个明确的对象，而恐惧却没有明确的对象，它本身和对象都具有一种不确定性，“恐惧是对所怕之物的欲求，是一种有好感的反感”（Kierkegaard 38）。所谓有好感的反感其实就是一种想要又不敢要，想摆脱又摆脱不掉的矛盾心理。面对恐惧的对象，个体之人可以选择走向它，

也可以选择逃离它。这种选择的状态，正是自由的原始状态。恐惧意味着自由的可能性，是自由的开端。人的自我意识正是在这种恐惧的状态中得以产生。

艾梨达天性向往自由，正因为如此，作为自由化身的陌生人才拥有了控制她精神的神秘力量。所以恐惧的真正原因其实来自于她自己的心灵内部，正如艾梨达所说：“威胁我的并不是外来的暴力。房格尔，可怕的东西在内部。可怕的是我自己心里感觉到的那股迷人力量”（368-369）。所以当十年后陌生人再次出现时，惊慌失措的她起先对丈夫说：“亲爱的、忠实的房格尔——你务必把我从那人手里救出来！”（327）后来又改口：“房格尔，把我从我自己手里救出来吧”（330）。艾梨达的恐惧实际上是对真正自我的召唤。正是在愈来愈强的恐惧之中，艾梨达强烈地意识到自我，意识到自由对于有意义之生存的重要性，当然自由也是可怕的，因为其中充满了未知的风险。艾梨达追求自由的过程就是其努力实践自我的过程！其实，一心渴求自由的艾梨达自身也具有类似大海的神秘而又可怕的特点，这也正是前面所说的艾梨达与陌生人的精神相契之处。

“你跟海很相似。”“你又能迷人又能使人害怕”（367）。房格尔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他眼中的艾梨达，正如艾梨达眼中的陌生人。

“海婚”给艾梨达造成的精神后果是严重的，这个心结成为艾梨达后来一切不幸的源头，直接影响并导致了其第二、第三个心结的产生。它并没有随着艾梨达正式结婚而解开，只是暂时隐匿了。世俗婚姻给艾梨达带来了“房格尔夫人”以及“两个孩子的继母”这样的生存位置和伦理身份。但不论是夫人的身份还是继母的角色，均使艾梨达无所适从。结婚多年之后她还是游离在整个家庭之外，找不到自己的真正位置。她开始认真审视自己与房格尔的婚姻，痛苦地发现他们的婚姻只是一场交易。当初，一个是刚死了太太，急于续弦；一个是孤苦伶仃，急需找个依靠。因此这场婚姻并非建立在双方真正自愿的基础上，在艾梨达看来，这就是他们婚姻不幸的症结所在。她暗暗将这场婚姻与当年那场荒唐的“海婚”进行比较，认为与陌生人的“海婚”是建立在双方自愿盟誓的基础上，与房格尔的婚姻却纯属交易。两次婚姻那次才是真正的婚姻逐渐成为艾梨达心中的一个巨大的问题，日益逼迫着她，使她一天比一天更深地陷入伦理混乱之中，导致了极大的身份困惑。因此，这桩在艾梨达看来以交易方式达成的世俗婚姻非但没有解开她的第一个心结，反而又重重地打上了一个结。这两个打在艾梨达心头的婚姻结给她带来的是伦理身份的混乱与困惑，它们纠缠在一起直接促成了其第三个心结的形成。这第三个心结最终成为艾梨达精神成疾的直接酵母。

第三个伦理结是前两个婚姻结缠绕在一起诞下的“怪胎”。它随着艾梨达的怀孕生子一步步地织就，它的形成正是艾梨达陷入伦理混乱的悲剧境况的明证。艾梨达与房格尔结婚一年后怀孕了，但怀孕给艾梨达带来的不是喜悦而是惊恐，一种极深的且又是难以向任何人启齿的惊恐。伴随着腹中胎儿的孕育成长，那个似乎已被艾梨达遗忘的陌生海员又出现在了艾梨达的幻觉之中，“有时候，一点预兆都没有，我突然看见他亲身站在我面前，或者稍微偏一点。他从来不瞧我。他只是待着不走”（294）。显然，艾梨达将胎儿与陌生人联系在了一起，

因为在她的潜意识里，她一直是在和他做夫妻。这一点，在《海上夫人》的初稿中表露得清楚无疑：“实际上，她本能地认为，她一直是和他过夫妻生活的”（Ibsen, Vol. XII 332）。这正是艾梨达不可告人的婚姻秘密。正因为如此，艾梨达才会因自己怀孕而焦虑不安，她混乱的伦理意识使她无法分辨谁是腹中胎儿真正的父亲。对这位潜意识中认定自己犯有重婚罪的女人而言，不管谁是孩子的父亲都意味着自己对其中一段婚姻的背叛！婚后的艾梨达其实一直是以一种身心分裂的姿态过夫妻生活，她的身和心分别在和不同的男人做爱，这无疑是一种婚姻性爱上的伦理混乱。怀孕使艾梨达意识到了这一点，她害怕这个新生命，因为这个新生命是其精神乱伦的产物，孩子的身上将打上乱伦的印记。果然，孩子出生后，艾梨达在这个小生命的脸上看到了一双和陌生人一样的眼睛。当然，这其实是艾梨达因极度的精神紧张造成的一种幻觉，是她主观上刻意在孩子身上寻找陌生人影像的后果。孩子不久就夭折了，可那双古怪的眼睛却再也无法从艾梨达的记忆中抹去。显然艾梨达把孩子当作了她和两个男人的两段混乱的婚姻联合产下的“怪胎”，这样的“怪胎”自然无法存活。艾梨达将孩子之怪、孩子之死视为对自己混乱的伦理行为的暴露和惩罚，伴随孩子而生的第三个心结的形成使艾梨达从此再也无法和房格尔过夫妻生活。艾梨达就是这样一步步地跌落进精神疾病的深渊。

二、两种生存模式与伦理选择

陌生人一去十年，然而就是在艾梨达精神危机的紧要关头，他突然出现，要履行自己当年的诺言。陌生人的出现，使艾梨达即刻面临着克尔凯郭尔式的非此即彼的选择：是和陌生人一起远走高飞，在茫茫的海上过一种未知的随意人生，还是继续和房格尔一起坚守脚下的这片陆地，过一种正常而平凡的家庭生活？一个是十年前神秘而浪漫的“海婚”，这是一种充分体现了人类的原始欲望和自由意志的自然婚姻，艾梨达对此既神往又害怕；一个是受法律保护，并已经历多年共同生活、有着深厚感情基础体现人类理性意志的现实伦理婚姻，艾梨达游离其外却又难以割舍，她究竟会选择遵守那一种婚姻伦理呢？

艾梨达，这个异教徒的名字已经显明了她的特殊，她不拘泥于寻常的婚姻伦理和外在的法律形式。这一点剧本中表达得非常清楚，当第四幕中房格尔以为妻子想按照法律手续跟他正式离婚时，艾梨达这样回答：“亲爱的，你完全不了解我。我不计较形式。这些外表的事情我觉得无关紧要。我希望的是，咱们俩应该出于彼此的自由意志解除相互间的束缚”（364）。不管是结婚还是离婚，艾梨达计较的都只是是否出于自由意志。因此她承认“海婚”的有效性，“一个自愿的盟誓具有与婚姻完全相同的效力”（362）。同样，由于自己当初嫁给房格尔不是完全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艾梨达认为她的现实婚姻并不是真正的婚姻，相反“那第一次（指“海婚”——引者注）——倒可能是真正的婚姻”（362）。

可见，艾梨达并不依照普遍的伦理法则来生活，而是依据自己的自然生命感觉来编织自己认同的伦理体系。她强调的是自由的生命伦理，这种伦理只能

建立在自由意志的基础之上。只有回归自由意志，重新回到起点进行独立、自由的选择才能解开致使她生病的心结。这样的选择，艾梨达其实已经等待了多年。从她生病的第一天起，她就从心底里惧怕并企盼着这一天的到来。这是她必须做出的选择。因此，当房格尔死死抓住她不放时，她的心自然偏向于陌生人，尤其是当她听到陌生人强调自己若要跟他，必须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之后。问题是，当后来房格尔放弃夫权，艾梨达能够以完全独立、自由的身份重新选择时，她的自由意志将指向哪个男人呢？艾梨达面临的实质是两种生存模式的选择，一种是陌生人所代表的审美的生存模式，一种是房格尔所代表的伦理的生存模式。这也正是克尔凯郭尔笔下人的两种互不相容的生存状态。处于这两种模式中的人对自由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

在审美模式中生存的人，追求的是一种绝对的自由，这种自由不受任何伦理道德和章法的约束，自然也和责任无关。陌生人就犯下了杀人的滔天大罪，当受到房格尔的威胁时，又扬言要自杀，声称自己“活着要自由，死也要死得自由”（406）。审美之人的生活受制于随意性极强的瞬间，缺乏稳定性和目标，追求的只是当下的快活与刺激。这类人的生活在时间上没有延续，在空间上不追求与他人建立普遍的联系，永远是一个孤独的人。陌生人对艾梨达的执着既非出自爱也非出自责任，只是受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自然本性驱使。当艾梨达质问他为什么死缠着她不放，是否因为他们有过诺言？他这样回答：“诺言不能约束人，男人也罢，女人也罢。如果你说我死盯着你，那是因为我没法松手”

（404）。这句话一方面说明了他的归来并非出自一个“丈夫”对“妻子”的责任，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他本身实际上也是不自由的，他的自由意志完全受控于自己的自然天性，行为完全受自己的本能驱使。因此，虽然他坚称“海婚”的有效性，对艾梨达的背信弃义感到愤怒，但并没有认为艾梨达有责任和义务必须跟他走，而是强调艾梨达必须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来做出选择。当艾梨达拒绝他后，他也并无半点伤心，扔下一句“从今以后，想起你的事情，我只当是在生活里翻过一次船罢了”（409），便扬长而去。人类原始的自然野性在陌生人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的人生是一种审美式的感性人生。

在伦理模式中生存的人则对人生的意义有清楚的认识，他们的人生有着明确的原则。伦理之人认为，幸福的根源不在于外部的那个变化不定的世界，而来自于人的内心。伦理之人在生活中按照自己的道德原则来行事，他们将善良、正义、宽容、节制、仁爱等美德视为人生的意义，认为自己的行为应该是这些美德的体现。当然伦理的人生会让人失去一些自然的天性，但这是他们的自由选择。房格尔作为陌生人的对立面，显然是一个伦理之人的代表。他所认识的自由必须受到社会伦理法则的约束。面对陌生人对自己妻子的荒唐行为，他认为自己完全有责任 and 权利去阻止它。这不仅是一个丈夫对妻子的保护，同时也是对自己权利的维护。但是最后当他看清艾梨达的精神症结所在，不得已痛苦地放手让艾梨达自由选择时，他实际上已经做好了将要失去她的准备。凭着对艾梨达的爱和责任，他甘愿做出自我牺牲，正像他原来为了缓释艾梨达的思乡

病,打算举家搬迁一样。当然这次的牺牲来得更大,更令他痛苦,但是对他来说,爱能战胜一切,正是爱,让他逐渐理解艾梨达、走近艾梨达,最后赢得了艾梨达的心。房格尔体现了基督教伦理道德所要求的仁爱、谦虚、宽容和牺牲精神。

艾梨达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挣扎在审美模式与伦理模式之间。作为来自大海的“美人鱼”,陌生人身上洋溢的那种放浪不羁的自由精神和原始野性深深地吸引着她。她向往审美的自由感性生活,但对传统的基督教伦理生活也有认同的一面。少女时代的她就常去牧师那儿,基督教宣扬的伦理道德对她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正因为她性格中的这种矛盾,所以她才会和陌生人“海婚”,过后又觉得荒唐无比。同样,当房格尔表示不允许她自由选择时,她一方面承认房格尔的夫权,另一方面又表示自己的精神是自由的:“房格尔!——我知道你可以抓住我不放手!你有这权利。并且确实还想使用这权利!可是我的心,我的思想,我的压制不住的冲动和欲望——这些东西你都没法控制!”(406)作为一直沉浸在丧失自由、丧失自我的痛苦中的人,这次的选择让她看到了实践自我、追求自由的可能性,这也是多年来一直压抑在她心底的企盼。艾梨达的三个心结归根到底是关于自由的心结,她必须完全凭着自己的自由意志做出不可回头的选择才能解开自己的心结。也就是说,她必须摆脱世俗婚姻的捆绑,以完全自由的独立人的身份重做选择。“我不愿意拿我是别人的老婆或者我自己无权选择这一类的话当做护身符,因为不自由的决定不能解决问题”(365)。

房格尔终于明白赋予艾梨达自由是拯救她的唯一办法。面对艾梨达对自由选择权的强烈要求,他不得已先于艾梨达做出了自己人生中最痛苦的选择——放手,虽然这个选择有可能使他永远失去心爱的人。他痛苦地宣布:“艾梨达,现在你可以自由选择,自己负责了”(407)。在给予艾梨达自由的同时,房格尔强调了责任与自由的不可分割,提醒艾梨达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起责任来。房格尔以自己的选择为艾梨达接下来的选择做出了表率。他的选择说明了真正的爱情还意味着责任,甚至意味着自我牺牲。房格尔为有责任的爱做出了很好的诠释。艾梨达一下子觉得两个人的心贴近了。“自由选择——自己负责?自己负责?这么一来,局面就完全变了”(407-408)。此刻的艾梨达顿时觉得自己回到了独立、自由的起点,她可以完全凭自己的自由意志对自己的人生做出选择,同时,这种自由意志还意味着在伦理上她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房格尔对艾梨达的真爱使他终于真正理解了妻子,他对婚姻态度的变化不仅留住了艾梨达的人,也留住了她的心。其实,艾梨达的精神危机原本就与房格尔不无关系。艾梨达婚后多年始终保持原来的样子,成为自己家中的局外人,一方面固然是艾梨达本身不作为,另一方面房格尔也要负相当的责任。在心灵深处,房格尔并不想让妻子做任何改变,他坦承:“实际上,我宁愿她保持原来的样子”(347)。因为吸引他的正是那样的艾梨达!一个与他不同,也与他周围所有其他女性不同,拥有独特的海洋般异质的艾梨达。当初,正是这些神秘的类似海洋的异质,使房格尔对她一见倾心。艾梨达被陌生人吸引是因为陌生人与她有精神契合点,而房格尔被艾梨达吸引的原因却恰恰相反,是因为艾

梨达与他完全不同！所以，房格尔从心底里不要艾梨达改变，不愿艾梨达沾染上丝毫的世俗气，何况他的长女博列得已经将家庭主妇的角色扮演得很好。作为一个男人，他更愿意永远用一种审美的眼光欣赏这个特别的女人，而不是真正去理解她，并且帮助她去适应这个新环境。这其实是一种自私的爱。因此，虽然他娶了她，却没有将家庭的责任赋予她，而是让她维持原状。艾梨达在这个新家表面上似乎过得轻松自由，但这种不需承担任何责任和义务的自由令艾梨达成了无根的浮萍，无法在这个家中扎下根来。后来艾梨达的精神状态越来越糟，房格尔才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后悔地向阿恩霍姆剖析自己：“你知道，我一向那么爱艾梨达！久而久之，我只知道先给自己打算。老实说，我是异乎寻常地自私”（347）。正因为家庭生活缺乏凝聚力和吸引力，艾梨达心无所托，陌生人对艾梨达的牵引才会越来越大。所以，陌生人在艾梨达的意识深处始终阴魂不散，这种不正常的婚姻生活也要承担相当的责任。婚姻虽然使艾梨达衣食无忧，但并没有给她的灵魂提供安居的寓所。艾梨达始终没有在这个新家承担任何的责任和义务，也不曾为建立和家人之间正常的伦理关系付出积极的努力，她在家中的伦理位置和伦理身份必然是虚空的。幸运的是，房格尔并没有因妻子的离心而打算放弃这场婚姻。他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不管是作为丈夫还是作为医生，他都觉得自己有责任治愈妻子，他展开了拯救艾梨达的行动，甚至甘愿为她放弃事业，准备移居到大海边。他的这种仁爱、宽容、忍耐正是传统的基督教伦理精神的体现，他以自己富有牺牲精神的行为向艾梨达诠释了什么是真爱、什么是责任。艾梨达最终选择和他在一起，不是没有理由的。

总之，对于影响自己人生的两个男人，艾梨达有着完全不同的伦理感觉。一个基于审美构想，是令她恐惧的一个既实在又虚幻的不确定对象；一个基于生活事实，是值得信赖并可依靠的伴侣。处于独立自由状态中的艾梨达坚定地选择了后者，她终于摆脱了陌生人的控制，解开了困扰自己多年的心结，实现了对自我、对自由的追求。艾梨达的选择代表了一种精神的飞跃，代表着她彻底地从人生的审美阶段飞跃到了伦理阶段。克尔凯郭尔认为，要从一种生存模式过渡到另一种生存模式，只能凭借个人在不同的选择中做出不受限制的、无法回头的决定才能达到。正是在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中，艾梨达实现了自我的生命价值。这样的选择无疑具有最高的伦理正当性。

三、伦理选择与人类的文明进程

作为一个思想复杂深邃的剧作家，易卜生的《海上夫人》关切的绝不仅仅只是一个名叫艾梨达的女子的个体命运，通过这个特殊的个体生命，易卜生还表达了他对整个人类文明进程的关切与思考。这个戏剧也绝非仅仅是对自由伦理的探讨，艾梨达的身份困惑和伦理选择还隐喻了人类在进化发展的关键时刻对自我的认识和做出的重大选择，以及由此选择决定的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反映了在达尔文进化论思想影响之下的易卜生对人类已有的发展轨迹和未来的前途命运的独特思考。

诚如艾伊文德·熊内兰德所言,易卜生的《海上夫人》“是对达尔文进化论的富有诗意的改写”(Tjønneland 324)。对人类的进化发展,易卜生怀有一种奇特的诗人式的忧虑,这种忧虑在艾梨达与阿恩霍姆的对话中表达得非常清楚。艾梨达伤感地表示人类最终没有成为海洋生物也许是走错了方向,她甚至觉得“人类自己在本能上也有这种感觉——这种感觉又像忧愁,又像悔恨,在暗中跟人类纠缠。人类悲哀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310)。当阿恩霍姆反驳说大多数人的日子都过得轻松快乐时,艾梨达饶有深意地回答:“你说的那种快乐正像我们在悠长光明的夏季享受的快乐,里头已经埋伏了就要到来的黑暗的预感。这种预感在人类的快乐心情上投下了黑影,正如天空浮云在海峡上投下它的黑影一样”(310)。这不正是本剧结局的写照?看来虽然易卜生肯定艾梨达的最终选择,但对她的未来是否从此就阳光灿烂还是怀有疑虑的。难怪法兰西斯·费格生如此评价艾梨达:“这个人物的本性是个哀伤、美丽的肖像,她体现了每人心中难言的悲怆”(费格生 389)。虽然《海上夫人》结局圆满,但萦绕在剧中的那股令人惆怅的忧郁气息却始终挥之不去。1897年,易卜生在给一个友人的题词中再次表达了他在本剧中流露过的有关人类发展的悲观论调:“人类的发展从一开始就行进在错误的轨道上。尊贵的人类后代应该进化成海洋动物”(qtd. in Tjønneland 324)。这说明对于人类的进化和文明的发展,易卜生一直抱有一种怀疑批判的态度,有自己的独特理解与思考。

沿着易卜生的这一思路再次审视作品中的三个主要人物,不难发现陌生人、艾梨达、房格尔分别象征着人类进化发展的三个阶段。² 陌生人以海为家,保持着人类全部的自然野性,没有任何能够区分善恶的伦理意识,代表着人类最初的原始状态,这时候的人与海洋动物别无二致,可以说就是一种海洋动物,全然处于一种感性的生存模式之中,只是徒具人形而已。房格尔医生显然是人类发展到高级阶段的样本,是现代人的典型形象,拥有知识和美德,是伦理之人的典范,但是这一形象也并非十全十美,由于丧失了人类的某些自然天性,他的性格显得拘谨而懦弱,连自己的女儿也觉得他缺乏魄力。与陌生人相比,善良的房格尔显然魅力不足。而艾梨达,易卜生用“美人鱼”来象征她,美人鱼的半人半鱼形象隐喻了艾梨达正代表着人类从海洋动物进化到陆居人类的过渡阶段,因此艾梨达的身份困惑不仅仅是来自于前文所说的由两种不同性质的婚姻造成的伦理身份混乱,还隐喻了人类在进化发展的过渡阶段对自己究竟是鱼还是人的困惑。艾梨达对两个男人的选择从表层上看是两个道德选项间的两难选择,深层则隐喻了人类在进化和文明发展的关键时刻对海洋和陆地的选择,过审美生活还是伦理生活的选择。简言之,是做海洋动物还是真正的人的选择。

艾梨达最终选择了房格尔、选择了陆地、选择了遵循人类已然的发展而不是回到过去。剧终时的艾梨达对自己的选择是坚定乐观的。但这种转折来得如此突兀也使人不免怀疑这种乐观与坚定能持续多久。马丁·艾思林就认为“艾梨达最后在充分的自由中决定委身于房格尔,看似实现了一个真实合法、和谐完整的自我,但这个自我仍然是不稳定的、有问题的”(艾思林 35)。值得

注意的是,易卜生本人也显得对此并非全然乐观,他在剧中多处理下了阴郁的伏笔,令人对艾梨达的未来不免产生一丝忧虑,同时也对人类的整体命运和前途增添了一份惆怅。剧终时艾梨达的心结已全然解开,但伴随着艾梨达精神上的痊愈,挪威明媚的夏天也将过去,海峡又要封冻,笼罩小镇的将是漫长的冬夜。艾梨达以后的命运将会如何?她的精神疾病还会再复发吗?这一切似乎都令人担忧。易卜生显然为此剧制造了一个开放性的结局。

业余画家巴利斯泰看似不起眼,但却是易卜生用来提挈剧意的关键人物,把艾梨达与“半死的美人鱼”意象联系起来的是他,在“适者生存”理论上与艾梨达相对照的还是他。“适者生存”是当时风靡欧洲的达尔文进化论的精髓,巴利斯泰正是本剧中环境适应者的典型。这个人总把“适应”一词挂在嘴边,为了适应新的环境,他掌握了好几行手艺。但值得深思的是,巴利斯泰的多才多艺显然流于平庸,绝对不是一个特别值得崇敬和效仿的杰出人物,更缺乏个性魅力。易卜生塑造这一人物时,明显带着几分调侃和反讽,让他一说“适应”就结巴,使这个环境适应者总也有不能适应的地方。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是一个不断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但适应和进化并不能完全等同,最适应者不一定是最佳者。巴利斯泰的平庸使人不得不反思在“适者生存”中行进的人类是否也因此丧失了一些本应延续的天性和能力?人类的某些特性就在不断的适应中退化了。看来适应既包括了进化也包括了退化。易卜生在本剧中流露的关于人类进化的矛盾思想可以在布林尼的话中找到共鸣:“进化经常被与进步的概念联系起来,并被认为是向着特定的目标发展的。但是这些表面上的趋向都是假象。实际上并不存在固定的方向,每个物种的进化历程都没有预定的持续时间,也没有最终的目的地”(布林尼 24)。易卜生在一些作品中对原本是海盗后代的现代挪威人的懦弱和奴性的批判尤其体现了这一思想,在他看来,基督教的伦理道德虽然使野蛮的挪威人走向了文明,但也软化了挪威人的意志和个性,使挪威人原始的骁勇野性丧失殆尽,剧中的房格尔不就是一个现代挪威人?作为一个对人类个体及整体命运和前途均有深入思考的作家,易卜生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不同思考呈现在作品中,从而使作品显得更为立体复杂,更富有深意。

《海上夫人》是一部有关自由伦理和伦理选择的戏剧。它关注个体生命的存在,但又不仅仅只是局限于人类的单一个体;艾梨达的选择也不仅仅只是她个人对不同生存模式的选择,还隐喻了人类在进化发展的关键时刻所做出的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伦理选择。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人类的个体生存始终与自由紧密相连,只有可以进行自由选择的存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存在,负责任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这就是易卜生所要强调的自由伦理。在《海上夫人》中,易卜生对人类个体生命存在的关切令人想到克尔凯郭尔的生存哲学,而他对整个人类文明进程的思考又使人联想到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虽然易卜生并不喜欢研究者在他的作品找寻他人的影响,但易卜生却在《海上夫人》中对克尔凯郭尔的生存哲学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做出了积极的艺术回应和思考。

注解【Notes】

1. 本文所引《海上夫人》原文出自 Mrs. Frances E. Archer 的英译文: Ibsen, Henrik, "The Lady from the Sea." *The Works of Henrik Ibsen*, The Viking Edition, Vol. IX.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2). 汉译采用潘家洵译文(《易卜生文集》第6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5年), 略有改动。以下仅标注英译本页码, 不再一一说明。
2. 此处借鉴了 David Rosengarten 的观点。David Rosengarten 认为陌生人与海洋紧密相连, 是生命发展最早期的代表, 房格尔代表了人类进化的高级阶段。艾梨达位于人类的过去和未来之间, 代表了人类进化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决定性时刻, 她必须做出选择, 她的选择意味着生命的进化。See David Rosengarten, "The Lady from the Sea": Ibsen's Submerged Allegory, *Educational Theatre Journal*, 29.4 (1977): 463-76.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马丁·艾思林: “易卜生与现代戏剧”, 汪余礼译。《戏剧》1 (2008): 30-38。
[Esslin, Martin. "Ibsen and Modern Drama." Trans. Wang Yuli. *Drama* 1(2008): 30-38.]
- 大卫·布林尼: 《进化论》, 李阳译。北京: 三联书店, 2003年。
[Burnie, David. *Evolution*, Trans. Li Yang, Beijing: The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 法兰西斯·费格生: “论《海上夫人》”, 《易卜生评论集》, 高中甫编选。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2年。384-394。
[Fergusson, Francis. "On *The Lady from the Sea*." *Critical Essays on Ibsen*. Ed. Gao Zhongfu.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82. 384-94.]
- Ibsen, Henrik. "The Lady from the Sea." *The Works of Henrik Ibsen*. The Viking Edition, Vol. IX,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2. 211-413.
- Ibsen, Henrik. "The Lady from the Sea." *The Works of Henrik Ibsen*. The Viking Edition, Vol. XII,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2. 327-77.
- Kierkegaard, Soren. *The Concept of Dread*, Trans. Walter Lowri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 艾伊文德·熊内兰德: “易卜生与达尔文”, 《易卜生创作的生态价值研究: 绿色易卜生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聂珍钊 周昕主编。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319-328。
- [Tjønneland, Eivind. "Ibsen and Darwin". *The Ecological Values of Ibsen's Works: Proceedings of Green Ibse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Eds. Nie Zhenzhao and Zhou Xin. Wuhan: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1. 319-28.]
- 易卜生: 《易卜生书信演讲集》, 汪余礼 戴丹妮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年。
[Ibsen, Henrik. *The Collection of Ibsen's Letters and Speeches*, Trans. Wang Yuli and Dai Danni.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2.]

责任编辑: 杨革新